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

跨越海洋的交換

朱德蘭 主編



中央研究院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跨越海洋的交換

朱德蘭 主編

中央研究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跨越海洋的交換 / 朱德蘭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
2013.10

面；公分. --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第四屆)

ISBN 978-986-03-8190-0(精裝)

1. 國際貿易史 2. 文集

030.8

102019666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跨越海洋的交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發行人：翁啓惠
總編輯：黃進興

主編：朱德蘭
編輯委員：朱德蘭、林滿紅、劉序楓
編輯助理：何書亞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
印刷者：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出版日期：2013 年 11 月

GPN 1010202059 ISBN 978-986-03-8190-0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文責。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HE TRANSOCEANIC EXCHANGE

Edited by Te-Lan Chu

Academia Sinica

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 余英時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召開國際漢學會議是在一九八〇年，原本希望以後每十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四屆，但距第三屆已十二年，算是遲了兩年。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人提議本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他認為台灣的漢學研究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這一提議卻引起了她對於所謂「漢學中心」的記憶和感慨。他說：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陳援菴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現在法國的伯希和等老輩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漢學家現在連唐、宋沒有標點的文章，往往句讀也被他們讀破了。所以希望漢學中心現在是在台灣，將來仍在大陸。

但六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漢學中心」說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試一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間漢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詭的景象：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但是漢學作為一個專門學

科 (academic discipline) 卻並不獨立存在，因為漢學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學科之中的，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之類。

第二，二戰以後各國漢學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不用說，漢學研究在各國活躍的情形頗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躍的國家也未曾取得公認的「中心」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分別考察各國漢學研究的大體趨向，便不難發現：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漢學研究的傳統也不能不是多元的，這是我們今天共同承認的基本事實。

基於以上兩點新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年最所縈心的「漢學中心」何在的問題，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堅持要在這個問題上討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祇好說：漢學猶如十六世紀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構想中的宇宙，其中心無所不在，其邊緣則無所在 ("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

自本院一九八〇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起，我個人每一屆都曾參與準備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們的唯一目的便是給世界各地漢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充分交流的學術平台，所謂「漢學中心」問題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我們承認並且尊重每一地區漢學傳統的獨特風格，但是我卻不願看到任何漢學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閉的道路。因此不同傳統之間的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和互相影響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相信，過去本院主持的三次會議多少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也能作出同樣的貢獻。

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感謝各地漢學同道們前來參加會議，特別是遠道冒暑而至的朋友們。我預祝大家有一次成功而愉快的學術聚會。

我個人因事不能到會，謹致最深的歉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在 1980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後以約 10 年的間隔舉辦一屆，至今已屆第四屆。2010 年初我奉翁啓惠院長的任命，擔任副院長一職，當時思考著幾件應該進行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漢學會議。在翁院長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順利召開，上距第三屆已有 12 年，而距離第一屆更超過 30 年。30 多年來，與會的學者在改變，討論和關注的議題也隨著時空的推移，不斷的變遷。

當代社會資訊發達，空間距離縮小，連帶促進了地球村的形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漢學」已不再是專屬華人的學問，而儼然成為國際性的議題。學者關心的議題，也不再限於一時一地，而更多跨領域甚至跨國界的觀照。

從這一屆所發表的論文觀察，我感到較諸以往有幾點不同。在這裡僅以史學為例，從「主題」、「材料」與「工具」三方面略作討論。

首先是「主題」的擴展，以歷史研究為例，早已跨出傳統「帝王家譜」的框架，進而更多關注基層社會的歷史，關心人民的生活。討論的議題幾乎可說已經沒有局限而充分展現多元。

從「史料」方面講，傅斯年所揭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繼續得到重視與發揚。尤其近年來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大幅改變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這裏所說的新材料，不只限於考古出土的史料，還應該包括過去被列為禁燬或長期處於邊緣的史料，這些以往不能看或不易看到的東西，經過大量的刊印後，如今都觸手可及，無異於「新出土」，提供給學者們一個研究的新寶庫。此外，許多數位化資料庫

的建立，使得過去數十年皓首窮經都做不到的事情，現在也許一個按鍵彈指間就可獲得，為學者帶來無窮的「近用性」。當然，我也必須強調，「檢索」不能代替閱讀。

從「工具」而言，科技帶來許多研究的新工具，數位工具的興起，使研究者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得到全面的改變。另外如 GIS 的應用，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事情，也使得研究的面向從單點連結到多點、甚至擴展為全面。這些新工具的產生及應用，是過去幾屆漢學會議所無法想像的事。當然，以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第五屆時必然會有更新的工具出現，其新異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成功召開，首先要感謝翁啓惠院長的全力支持，余英時院士慨允擔任大會主席，黃進興院士和黃樹民院士力任艱巨。世界各地學者的熱烈響應，更是我們必須表示敬意與謝意的。

在會議召開一年後，全帙 22 冊的會議論文集得以出版，這要歸功於出版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以及李宗焜博士、葉光輝博士與各冊主編和學者專家的配合。不論會議期間或出版過程，還有無數的助理同仁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全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謹代表中央研究院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序

大會祕書處

二〇一〇年四月，翁啓惠院長由於關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指示，籌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語言研究所會同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單位，共同配合辦理。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遂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如期召開大會。各國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二九二位，主持與評論者計四十三人，全體與會人員更達一千六百之眾，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會議具有四大特色：首先，進行深度討論，會議論文發表者，兼做主持人與評論，角色彼此替換；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區的探討；其三，新領域與新議題的開發與探索；最後，迥異於往昔只有資深學人參加，此次廣邀富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與會，副教授以下達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會議期間，雖值颱風侵襲，與會人員一本初衷，風雨無阻，踴躍出席，討論熱烈，成果甚為豐碩。會後，復承王汎森副院長交待，成立編輯委員會，審議提交論文，俾便結集成冊。茲將最後定稿梓行，以供學界分享，並就教於諸方大家。

最後，本會議論文集得以刊行，必須感謝各分冊主編，尤其是出版委員會的編輯祕書李宗焜教授。

謹列本屆國際漢學會議攸關工作人員如下，並致謝忱：

主席兼召集人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祕書長兼副召集人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祕書長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執行祕書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恭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鄭秋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顧問（依姓名筆畫順序）

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賡武（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郝延平（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莊炳煌（中央研究院院士、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許文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中央研究院院士）

葉文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導論

朱德蘭*

近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界跨越國家、族群間之界限，從海洋、地域、河流、邊境空間的管理到人的移動，從商貿網絡的建構、異文化的交流到人文生態的變異，進行跨學科、跨領域不同層面之研究漸漸興盛。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呈現跨領域之研究特色，2010年參與了本院結合六個研究所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大會。

2012年6月20日~22日，本中心與六個研究所同步在各自機構舉行「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跨越海洋的交換」為會議主題，本書即為此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八篇論文中，經過嚴謹審查過程，集結付刊之成果。

《跨越海洋的交換》共收錄六篇論文，分為：（一）交流與媒介、（二）人員移動、（三）商品交換等三大研究領域。為幫助讀者瞭解研究旨趣，茲將每篇論文概要介紹於後。

首先，就第一單元交流與媒介而言，中島樂章的論文〈十七世紀初九州中部海港與閩南海商網絡—肥後地區之明人墓與唐人町—〉，主要利用《籌海圖編》、《日本一鑑》、《海澄縣志》、《肥後國玉名郡村誌》、《肥後國志》、《慶長日件錄》、《增訂異國日記抄》、《新熊本市史》等地方志及第一手史料，輔以現存九州明人墓與唐人町遺址的踏察，深入探討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兼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近世閩南海商在日本朱印船貿易中的角色。

中島樂章指出，16、17 世紀之交，閩南海商以漳州、泉州為根據地，透過同宗同鄉關係在東亞海域形成了廣闊的貿易網絡，海商頻繁地航往日本從事貿易活動，久而久之便在九州之肥前、豐後、薩摩、大隅、日向等地，建立起俗稱為「唐人町」的華人居留地。其中，位於肥後（現今熊本縣）北部的高瀨、伊倉地區是其貿易據點。例如，肥後領主加藤清正在郭濱沂（肥後四官）、謝振倉、林均吾等人的協助下，派遣朱印船前往呂宋、暹羅、交趾等地販售貨物。

在朱印船貿易中，雖然閩南海商起了重要作用，但現存肥後方面的史料卻很缺乏。本文為解明諸疑點，而另覓途徑，即通過對伊倉之中國式墓葬的碑文，和對熊本等地「唐人町」遺址的田野考察，來重建 17 世紀初閩南海商在東亞海域中的交易網絡及其運作實況。

本文認為，從加藤清正與華商之間的密切聯繫；郭濱沂、謝振倉、林均吾三人之墓碑；「唐人町」、「三官」地名的存在，應可推論當時肥後是被含納於以漳州灣為中心，廣及東北亞、東南亞全境的福建海商貿易網絡中，而伊倉港是其中一個關連港，其地理位置及國際性格頗需重新審視。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資料運用上頗具慧眼。本來，在伊倉一地和同時代的史料中，除了片段的記載外，並未留下郭濱沂的相關記錄，但作者根據《肥後国玉名郡村誌》、《玉名市史》等地方志，參照《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逐一梳理郭濱沂與英國商館及朱印船貿易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海澄縣三都出身的郭濱沂即「肥後四官」是作者的重要發現。本文還利用三都地區青礁慈濟宮的〈吧國緣主碑記〉，指出此座宮廟不但與同安縣白礁慈濟宮皆屬閩南、臺灣、東南亞閩南系華僑的重要信仰保生大帝之祖廟，且推論海澄縣海商與巴達維亞華僑之交流關係淵源已久。

劉序楓的論文〈清代的中日貿易與唐通事〉，主要探究清代唐通事在中日貿易中的職能及其運作實況。有關唐通事的登場，起源於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有貿易實務與溝通翻譯上的需求，因而設立了「唐通事」官職，其

人才來源大多由鎖國前定居日本的中國人及其子孫世襲。唐通事從唐船貿易到管理船員水手，除了負責收集海外情報外，另主掌許多不同的事務，包括：翻譯、貿易、外交、維持秩序等。正因唐通事需做縱向與橫向的疏通，居間協調及仲介貿易業務，故有相當程度上的貿易裁量權，從而為中日貿易中很重要的媒介。

儘管如此，有關唐通事的資料，除了現存《唐通事會所日錄》之初期公務記錄外，並無其他完整的資料。本文有鑑於此，為能釐清既往研究諸多不明之處，而以唐通事在實務上所使用的語言訓練教材《譯家必備》，及現存中國商人致通事的書信，如《清人書狀》、《尺牘抄》等為基礎史料，輔以《通航一覽》、《華夷變態》、《長崎實錄大成》等日本官方記錄，重新比對梳理，針對：唐通事的組織與職務、唐船進港到離港的貿易過程、中國商人和唐通事的交往實況等，做了具體細緻的分析。

本文將複雜的唐通事位階、唐通事任職姓氏與人數、收件唐通事人名履歷，井然有序的整理成表，並透過唐通事私人書信的分析，讓人容易明瞭當時商人在遭遇種種問題時，如何與唐通事交涉折衝，如何競爭、維護自身之利益。又，中國商人在貿易過程中，也各顯神通的尋求通事協助，似此體制外的私下協商行為，多少可以反映長崎中日貿易的傳統與特性。

其次，在第二單元「人員移動」方面，鄭永常著〈港市與華人：晚明東亞貿易商埠形成之華人元素〉一文，針對 16-17 世紀東亞重要海港城市的形成背景、東亞本地海港城市的開埠與華人、東亞殖民海港城市的開埠與華人、海洋華人的性格等項，以華人進出東亞海域為主軸，從多樣性比較的視野，做了宏觀性的論述。

本文指陳 16 世紀以降，東亞海域伴隨歐人的東來，經歷了一次不尋常的變遷，商品交換欲望是促成這個改變的主要因素之一，華人在海域間的移動尤為重要的媒介。進一步說，當時東亞澳門、馬尼拉、萬丹、暹羅、會安、長崎、巴達維亞、大員等，諸多海港城市的興起，雖和西力東漸、晚明中國海洋政策的影響有關，但華人應是促成其量變與質變的要素。

本文由海洋華人的性格觀察，論述華人在東南亞經濟發展上位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馬尼拉 (1603、1639)、大員 (1652)、巴達維亞 (1740) 等歐洲殖民地海港城市，幾乎都對華人發生過大屠殺事件，但於東亞傳統對華人尊重的長崎、暹羅、會安等地，卻未發生類似情形，歐洲人與東亞民族性格的不同，由此可見。

相較於既往研究比較側重明朝遺民對東南亞的開發和貢獻。本文還強調，明朝亡國以前，中國人在東亞各埠因已打下了良好的根基，所以迄今為止，在曼谷、西貢、檳城、新加坡、吉隆坡、香港等地，仍可看見華人的歷史遺跡，華人在東亞現代化進程中，仍具有強大的推動力。

降至近代，東亞地區華人數量的驟增不免引起西方殖民國家的疑慮。聶德寧著〈十九世紀中葉巴達維亞的華人新移民—以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檔案資料為中心的分析〉一文，即以吧城華人公館（吧國公堂）檔案及相關文獻資料為依據，針對 19 世紀中葉巴達維亞華人新客移民的來源、類型、構成、移民路徑，以及吧城華人公館對華人新客移民入境管理的許可權與職能等項加以探討，深入分析荷印當局對華人移民吧城的政策、新客移民的方式、吧城華人公館對新客移民管理制度、帆船貿易時代貿易與移民的相互促進，以及其對殖民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與影響。

本文指出，荷印政府及吧城當局對華人新客居住吧城逐步採取：限制華人自由流動的通行證條例（*Passenstelsel*，1816 年）、華人新客擔保條例（1833 年）、居住區條例（*Wijkenstelsel*，1835 年）等措施，應是 19 世紀阻礙吧城華人口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作者又指陳，荷印政府嚴禁新客移民的影響，導致中國船前往吧城貿易之數量遽減，而吧城商貿活動的衰落、華人人口的緩慢增長，與同期英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的繁榮恰好形成強烈的反差，探究新加坡港口、城市建設的勞動力來源及其蓬勃發展，則多得益於中國帆船貿易的興盛與華人新客移民的增加。

在第三單元「商品交換」方面，Paul A. Van Dyke（范岱克）“Packing

for Success: Sago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一文饒富有趣。范岱克以東南亞生產的西谷米，也就是國人喜好的甜點「西米露」的原料為研究對象，但其重點並非將西谷米作為糧食或食物之商品價值，置於 18 世紀中國貿易中之意義進行研究，而是從西谷米的特性，亦即：密度大、質量重以及被認為有治療效果等特性作為研究視角，詳細探討西谷米在 18 世紀中國貿易中之特殊作用。

本文先從西谷米作為包材、壓艙物、與貨墊等用途著手，陳述這些用途對商船遠程貿易有何意義。本文指出，西谷米除了可以被當作糧食以及食品添加物外，也是一種有用的包裝材料。具體的說，西谷米有重量和密度，將它填入中空瓷器中不僅可以降低器物的破損量，同時還可提供顯著的重量的重量以為壓艙物，此外將它裝袋還可用來充當貨墊填充船艙裡的空位。由於西谷米擁有這些特性，可以增加商業利潤，與此同時並能使船隻與貨物運輸安全，因而促使中國對它有更多的交易需求。

再從中國貿易觀察，作者發現西谷米雖是中國貿易活動中相當特別的商品，但卻不知道起源於何時。其實，18 世紀東南亞年年裝載西谷米於中國船與外國船上運銷各地，每年在廣東的總貿易額裡不大，估計不會超過一萬擔，總貿易額之所以不明，應與許多西谷米被當作糧食進口，業主可以規避被課徵消費稅，因而沒有進口的記錄有關。

復次，作者從相關文獻及研究中發現，西谷米在當時因被認為具有治療效果，可以治療生病的船員，特別是感染壞血病者，因此常被登記在船隻的貨單中。總結上述諸特性，作者認為，西谷米是貿易船中的一項重要商品，是東南亞產品在中國貿易中獲得成長，且扮演商品交換角色的一個成功範例。

辛德蘭（朱德蘭）的論文〈臺灣與日本之間米與海產品的交換：長崎華商泰益號的跨越海洋網絡（1901～1910）〉，主要利用學界較少利用的長崎華商泰益號文書，針對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臺灣米銷售日本、日本海產品銷售臺灣、泰益號擴展貿易網絡等項，通過商品移動之背景、貿易實

況，分析長崎華商泰益號建構跨洋貿易網絡之特色。

有關日本人對臺灣米的需求，就臺灣來說，日本自 1895 年殖民統治臺灣後，由於在臺駐軍、寄留官民的需求，而開始食用臺灣米。日本本土方面，則因受到軍需產業經濟發達、都市化與工業化快速發展、眾多農村青年出外就業、天災頻仍、人口增加等複合因素的影響，導致食糧不足問題日益嚴峻，而臺灣在來米生產量大、價格便宜、米形類似日本米，日、華、臺貿易商可用低廉的價格採購，經過一番調製，與日本米混合後，以較高的日本米價格出售獲利，所以臺灣米輸日數量相當可觀。

關於臺灣人對日本海產品的需求，則因一、日本是世界著名的水產大國，其中，長崎縣生產的鰯魚、魷魚、鮑魚頗富盛名；二、在臺日軍、官民及臺灣民眾也有需求；三、臺灣漁業技術落後，加工製品遠不及日本本土種類多、產量大、品質優；四、臺灣總督府對來自對岸輸入品課徵稅率；五、貿易商積極行銷等因素之作用，故使臺灣成為日本海產品的一大消費地。

泰益號經銷商品的方式是：自辦、委託客戶購銷、與客戶合資買賣、投資特定對象等四種。舉例而言，泰益號代客買辦、銷售商品，各按貨價抽取百分之二傭金，和貿易夥伴合謀則由雙方平均分擔損益。值得指出的是，泰益號與核心客號的交往，其資金流動雖都由銀行辦理，但因臺灣本地結帳有分期清償的習俗，鑑於臺日兩地資金流動速度不同，銀根易生阻塞，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有用以物易物之方式抵帳，或有以代收、代付款方式轉帳，憑藉雙方信用來清償貨款或相互融資的情形。

本文除了從商品交換之視角，層次分明的討論：商品市場供需→商業情報交換→商品流通方向→資金移動→各地市場銜接等貿易實況，以及其建構跨海貿易網絡之特色外，也藉由 20 世紀初臺灣在來米銷售日本本土的分析，修正了既往研究當中，所謂：「日治初期日資不曾注意臺灣米輸日，直到 1925 年以後蓬萊米大量輸日為止」、「日治時期臺灣對日貿易均由日本商人所掌握」之觀點。

本書的問世，應對參與「跨越海洋的交換國際學術研討會」初期規劃人：章英華（本中心前任主任，現任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陳國棟（本中心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惠予建言；陳恭平（本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大力支持；研討會各場次主持人、評論人、論文發表人、與會人士的交流與討論；編輯委員林滿紅（本中心與近代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劉序楓（本中心副研究員兼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秘書）協助編輯；匿名審查人；本中心博士培育生常修銘、游智勝協助校稿；行政助理何書亞協助聯絡等，一併表示深厚之謝忱。